清前期南京经济略论

范金民

清代前期，南京经济较之明代更为发展。然而对于它的发展状况，至今未见有专文论述。今仅就其发展阶段、特点及其原因等，略作探讨。敬请行家指正。

一

从顺治二年到康熙二十年（1645—1681），是南京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历时近四十年。在这个阶段，清初的统一战争和平定三藩直接影响了南京经济的发展。

顺治二年清廷底定南京后，在实行野蛮的民族高压政策的同时，又以南京为统一南方的大本营，举凡兵马、粮糈、军械等一切供应，或明令征取，或强行掳掠，勒令工商人户承值应办，抑勒城市铺户。诚如当时巡按卫贞元上疏所言，“江宁为阖省会城，凡钦使之往来，大兵之调发，率由焉。水必封船，陆必养马。诸如刍粮槽锄锅缸蔬肉等项，无一敢缺。顷师旅会集，供应益繁，而搬运需夫，动辄万计”①。在官府凭票取物，军队苛索供应，地棍恣意敲诈下，南京经济不但不可能得到丝毫发展，反而呈现出萎缩萧条的凄凉景象。“士无恒产，多鹑结以兴嗟；农即力田，亦鸠形而浩叹；百工技艺，日应繁差不暇，不免号饥；坐贾行商，月值飞票，班头可怜尽折。”②

为保证兵马的输送和粮械的载运，清廷还强令封禁民船。“所封之船，虽给食米等项，然船中所载之货，必移置于岸上，坐困商贾”。封船之举，涉及面广，次数频繁，仅总督郎廷佐就任的短短几年中，就有四五次。③南京位于交通要道，全赖舟楫转输。封船之举，使得商贾裹足不前，商业萧条。

南京最重要的手工业丝织业同样遭到盘剥。恢复于顺治二年的官营织局，“其一应匠作工价，比因开织之初，惟期撙节，所定工价甚寡，较之段匹、倭缎仅十之二三。此各匠虽有工价名目，实皆民间各户雇募应工”④。民间丝织业，“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当五十金，织造批准，注册给文凭，然后敢织”⑤。清廷或强行金派，令应织机户赔累，或苛以重税，加重民间丝织业者负担，阻碍了丝织业的发展。

在封建政府的肆意掠夺下，南京城“百货萧然，无复昔日京华之盛”⑥。象征南京繁盛的秦淮风月，清初也已是“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闻”⑦。

二

自康熙二十年直到道光二十年(1681—1840)，为南京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历时一百六十年。随着三藩告平，台湾统一，南京同其它江南城市一样，经济由逐渐恢复到稳步发展，达到了封建经济的鼎盛阶段。南京城西北一带的长江中，“帆樯出没，不可纪极，上下两江，

旅舟商舶，络绎奔凑”⑧。城内，雍乾之际，吴敬梓描写到：“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⑨。这自然是小说家言，有所夸大，但清中期南京再度繁荣却是事实。乾隆时，城内仅隶属上元县的街道就有20条，合之江宁，至少有30条。嘉庆时，全城东西向和南北向的街道各有17条。嘉道时甘熙也称南京“街衢通达，闾阎万千，异乡人每茫然莫辨”⑩。不但街巷棋布，而且民居稠密，以致屡有火患。明代可容九轨的街衢洞达之区，到清中期“为居民侵占者多，崇閎之地半为湫隘之区”⑪。这个阶段南京经济的发展，大体由如下内容所构成。

第一，人口增多。根据现有资料，很难确知清代南京的人口。清初，上元江宁两县人丁为50682，顺治五年增为51733丁，46693户，184908口，按明代城乡人口比例推算，扣除农村部分，城市在籍人口仅在 8 万人左右⑫。这个数字显然偏低。顺治十五年，卫贞元奏中称，“省会绅士兵民以及工商伎艺等类，数逾百万”⑬。这包括了相当多的流动人口，但仍显得偏高。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时，据说“城中阛阓充实，烟火万家”⑭，加上流动人口，离百万之数相差还很多。乾隆十一年编审烟户，江宁一县在城共41241户，157110口，如果以顺治年间江宁占南京人口的比例推算，上元在城人口应为411100口，两县共为568209人⑮。嘉庆十四年，两县民丁军丁共1379615，加上女口，南京城市人口估计达110余万。这个估算数似乎较为接近实际。嘉庆二十年，据包世臣估计，320余万石粮可供城中居民三月之食，按人食 1 升计算，人口应是110万⑯。这已经超过万历年间全盛时期的人口数，比清初大约增了整整10倍。人口的增加，正是清中期南京繁盛的一个标志。

第二，手工业的发展。清代南京最重要的手工业仍然是丝织业。其发展具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官、民营同时获得了发展。先看官营丝织业。自顺治十一年起，清廷在江南三织局正式实行买丝招匠制，遇工雇募。平定三藩后，国家财政有所好转，织造经费有了基本保证。江宁织局设有600余张织机，招募2000余名工匠，自康熙末年直到咸丰二年，每年动用 5—6 万两银子，织造近4000匹各色缎匹，生产一直较为稳定，工匠待遇也较为丰厚⑰。较之官营，民营丝织业更蔚为大观。织工多集中在聚宝门西偏。其人数，甘熙说：“不下数千百家”⑱。同治《上江两县志》称，“乾、嘉间机以三万余计，其后稍稍零落，然犹万七八千”。另有材料载，其全盛时，“城厢内外缎机总数常五万有奇”⑲，以此为生者达20万人。南京是当时全国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参照苏杭等地的机数，南京丝织业全盛时，织机肯定超过一万。以往论者仅据嘉庆府志，认为织工仅千余人，恐怕不符合实际。丝织的品种，绸有宁、宫、亮花之别，缎有锦、闪、妆花、暗花、五丝、线、摹本之别，纱有西纱、实地、芝地、直纱之分，并有绢、罗等类。其纹样图案，有八宝、仙人、兰鹤、夔龙、芙蓉、牡丹、鸾凤、云霞、麒麟、麋鹿、楼阁、荷渠等。其销路，“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沂淮泗，道汝洛”⑳。南京丝绸以其量多质优，在国内外拥有了广阔的市场。二是生产关系较为先进。至迟在康熙前期，南京民间丝织业已开始采用账房领织制的形式。根据清末人的解释，帐房是置买丝料，发放机户领织而自身不营机业的商业资本的代表，属于列宁所说的包买主的范畴。个体小机户从账房那里领取丝经等原料，在自己家中并主要以自有的织机为账房加工丝织品，织成缴予帐房，领取报酬。这样，包买主控制了个体小生产者，个体机户就与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的联系都被切断，“成了在自己家中

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包买主的商业资本在这里就变成了工业资本。于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形成了”㉑。清中期南京丝织业账房的规模甚为可观。康熙年间曹寅任江宁织造时，奏免机户额税，“自此，有力者畅所欲为，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㉒。如李扁担、陈草苞、李东阳、焦洪兴辈，都领有400--500张织机，显赫一时，可见这种领织制的兴盛。除了普遍的领织制，据说“亦有雇机匠于屋内者”㉓。从“金陵首尚贡缎，机坊致富十室而九”㉔来看，大概作坊主的雇佣生产也曾存在过。但这种形式在南京丝织业中既不起重要作用，也没有获得普遍的发展，到后来多为账房“放料”所取代。

仅次于丝织业的是剪绒业。产地在孝陵卫一带，织成的毯罽等物，同西洋所出一样紧密，远近争购。甘熙称“其盛与绸缎埒。交易之所在府署之西，地名绒庄。日中为市，负担而来者踵相接也”㉕。另一个远近驰名的重要行业是明代以来的传统行业折扇制造业。扇面用杭连纸者谓之本面，用京元纸者谓之苏面。扇骨有樱桃红、湘妃竹等。康熙间，金陵仰氏扇、伊氏素纸扇，四方崇尚㉖。清代南京是书籍中心，刻书印书业继续发展，“雕印书板，海内资之，粗者多而精者亦不乏”㉗。粮食加工业，嘉庆时城中仅大型砻坊就有32家，每家存粮至少达万石。其它如刺绣业、硝皮业、铜铁器业、制酒业，以及附属于丝织业的各业，在这个阶段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第三，商业兴盛。一是市场增多，范围扩大，并形成专业市场。康熙初年，城中大小市集仅有11处，到康熙后期，即增加为27处㉘。南京人口众多，每年需从长江上中游输入数百万石粮食。因而米市、米铺林立，砻坊附近的聚宝门沿河和上新河一带尤为集中。康熙四十七年因岁饥而被抢的米铺就有三四十家㉙。上新河是明代以来的竹木米豆集散中心，集中了川广杂货米豆行，贸易规模和数量都远超往昔。武定桥西滨临秦淮处，也有不少竹木行。自三山街西至斗门桥，为果子行，系时果所聚处。三山街更集中了体现南京特色的绸缎铺和折扇铺。前者有绸缎廊，廊中谈见所和奇望街的汪天然两家出售的黑绉包头，天下闻名。后者不下数十家，尤以庆云馆为最，“揩磨光熟，纸料洁厚，远方来购，其价较高”㉚。书坊则集中在状元境，比屋而居，多达20余家。供应丝织机具的有机店、梭店、竹器店、范子行、边线行等，分工甚为细密。姚家巷利涉桥一带由苏州人开列的星货铺，专卖妇女用品。他如伍少西毡货、吴玉峰膏药、杨君达海味，都是专卖某种名特产品的专业店铺。专业市场的出现，表明清中期南京的市集贸易已随着商品交流的扩大而呈现出专门化的趋向。据同治四年颁刊的《钦定户部则例》记载，当时南京共有商业铺行52类，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南京城市商业行业的繁多、分工的细致和发展趋势。

二是云集南京的外地商人纷纷建立会馆等商业组织。商人会馆是商业发展的产物。明代南京的会馆，目前仅知有福建莆田的文献会馆和广东的潮州会馆㉛。到清中期，据说“会馆之设，甲于他省”，安徽、山西、陕西、江西、江苏崇明和洞庭、浙江湖州等地、福建、山东、河南、两湖的商人都建有会馆，多达二十余所。尤以安徽商人的会馆最多，有12处㉜。安徽商人势力最大，而其中又首推婺源木商。清廷所需的皇木和地方政府所用椿木、架木等，全由徽州木商采办。与徽州毗邻的宁国府商人，在南京几乎可与徽商抗衡。《旌德会馆志载》：“金陵陪京，四方走集，衣食于斯者，八皖之民倍于他省。而会馆之建，旌邑乃独有三：一在党家巷，一在竹杆巷，一在油市大街”㉝区区一县会馆多至3所，是与其商人之多相一致的。旌人为贾，“或托业于荆楚，或贸迁乎吴越，或散处于蜀山易水之间，而荟萃

于金陵者，尤为伙焉”㉞。旌德县商人和其它宁国府商人主要经营粮食、烟叶。仅次于安徽商人的是江西商人，所建会馆是会馆中最为壮丽的，其门外花楼皆用精磁砌成。江右商主要贩运瓷器、竹木、纸张、书籍、漆、麻等。他如洞庭商主要贩运丝绸、布匹，崇明商主要贩运粮食，浙江商主要贩运丝绸、书籍、酱，福建商主要贩运南货、洋货，山陕商主要贩运皮毛，河南商主要贩运丝绸、煤炭，两湖商主要贩运粮食。

三是商税的增多。龙江西新关额银在清中期为80522两，比清初增了36.7%。两关每年还上交赢余银88000余两，解部铜斤银18461两。三项合计实为186983两，是清初税银的 3 倍多。表明这时的交易量已数倍于以前。

第四，服务行业各具特色。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为广大工商业者、达官健吏、文人游客服务的饮食业、文化娱乐业也迅速兴起。茶馆酒店是城市经济风貌的反映。清中期，南京茶馆遍布，酒店林立。令缙绅士子和豪商巨贾消魂荡魄的秦淮河房，到乾隆中期再度兴盛，“裙屐笙歌，依然繁艳”，自利涉桥至武定桥，两岸河房，丽姝栉比，苏帮扬帮，竞相争妍㉟。而且似乎有超过昔日之势。茶馆酒楼耸立于青楼之间，相映成辉。酒店著名者先有泰源、德源、太和、来仪诸家，后有便意馆、新顺馆、一品轩等处。新顺为吴人所开，馆中扣肉徽圆、荷包蛋、卤鱼、闷肉、煮面筋、螺羹等菜肴，以及酒碟之鲜洁，酒味之醇厚，一时无出其右。茶馆则文星阁东首之鸿福园、春和园，贡院前之金陵春、金陵村，利涉桥之阳春斋、海天春，淮青桥之四美斋，中正街之悦宾楼，最为有名。馆中烟则皋兰水烟、霞漳旱烟，以次而至，茶叶则云雾、龙井、珠兰、梅片、毛尖，随客所欲，中间还佐以酱干花生、瓜子、小果碟、酥烧饼、春卷、水晶糕、花猪肉、烧卖、饺子、糖油馒头等。这些茶馆实际是合茶、烟、小吃为一的茶食店，是为适应秦淮冶游而开设的饮食行业。城中其它地方茶馆酒楼也在在皆是。茶馆酒楼因其来人杂，而且常客多，信息快，来源广，所以不但是人们饮食消遣的场所，而且也成了商人洽谈业务、主雇确立劳资关系的联络场所。

三

清代前期南京经济的上述两个阶段，其发展步调与全国经济相一致，其发展轨迹较之苏杭等其它江南城市更为清晰。这与它处于东西南北往来之冲大有关系。

清代南京由陪都降为省会，政治、军事中心地位突然下降。这种中心地位的丧失，本可导致经济上的迅速发展。然而由于清初统治者对工商人户实行采办、买办、承值以及封船载兵等落后而又野蛮的措施，这种机遇就丧失殆尽。南京经济主要由手工业经济和贩运贸易经济所组成，前者的发展尤其需要依赖后者。南京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丝织业中心，所用原料同明代一样，却要购自湖嘉苏杭地区；次于丝织业的制扇业和刻书业，所用纸张要来自江西等地，较为发达的绒毯业，所需羊毛来自陕西，即使是粮食加工业，所需粮食要来自江西湖广。南京本地几乎没有大宗手工业生产品的原料基础。没有大量商人的长途贩运，将源源不断的各种原料输入南京，并将成品输向外地，南京经济是不可能获得发展的。清初统治者封禁客船，将南京的对外通道切断，犹如割断了南京日夜搏击的动脉和流遍周身的血管，南京经济萧条无生气，乃是必然的。

当清王朝政局渐趋稳定，财政开始好转，摧残工商业的落后措施相继废除，南京通财货

的流通中心的作用就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丝织业利用它的传统优势，一跃而为全国最大的生产中心。刻书业、制扇业和铜铁器业继续成为南京的重要行业。商业活跃，会馆众多，转输贸易盛况空前，市集贸易向专业化发展。适应社会各阶层生活的服务行业也迅速崛起，并由明代的或多或少的官有化变成全系民办。这一切都表明，南京在清中期已由明代的政治军事中心转向经济中心，并由流通、消费的中心转向生产与消费并重的城市，发展规模也远非昔日可比。但是，必须指出，清中期南京的经济结构与明代无大变化。手工业只有规模的扩大，而无行业的扩充，大宗的人民生活必需品只有丝织一业。商业虽极为兴盛，但也主要是转输贸易。青楼再度栉比于秦淮河畔，又反映出南京仍是寄生性消费的风流绝佳处。当苏杭城市工商业普遍以行业为特色建立公所组织时，南京工商业者却仍然以地域为特色建立会馆组织，这既说明了南京的商业特征，又说明了南京经济落后于苏杭的差异。因此，南京始终没有完成上述转化。鸦片战争后，南京先于苏杭而沦为第二批通商口岸，这恰恰说明了它在清前期的经济特征。

---

①② 卫贞元：《敬陈江属疾苦疏》，康熙《江宁县志》卷一四《艺文志》。
③ 郎廷佐：《请舒江南三大困疏》，康熙《上元县志》卷一五《艺文志》。
④ 康熙四十七年六月，李煦《与曹寅会陈织造事宜折》，《苏州织造李煦奏折》。
⑤㉒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三五《拾补》。
⑥ 金濬：《金陵水利论》，《国朝金陵文钞》卷三。
⑦ 余怀：《板桥杂记》自序。
⑧ 康熙《江南通志》余国柱序。
⑨ 《儒林外史》第24回。
⑩ 甘熙：《白下琐言》卷四。
⑪ 《白下琐言》卷一。
⑫ 康熙《江宁府志》卷一《赋役》。
⑬ 卫贞元：《东南绸缪宜豫疏》，《皇清奏议》卷一五。
⑭ 乾隆《上元县志》卷首《南巡》。
⑮ 乾隆《江宁县新志》卷六《建置志》。
⑯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齐民四术》。
⑰ 关于江宁织局的生产量，参见拙作《清代前期江南织造缎匹产量考》，《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
㉗ 嘉庆《江宁府志》卷一一《物产》。
⑱㉕ 《白下琐言》卷八。
⑲ 《申报》，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六日，《金陵机数》。
⑳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食货》；嘉庆《江宁府志》卷一一《物产》。
㉑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328—329页。
㉓ 程先甲：《金陵赋》。
㉔ 金鳌：《金陵待征录》卷八《志事》。
㉖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八《记扇》。
㉘ 康熙《江宁府志》卷三三《摭佚上》；康熙《江宁县志》卷三《市行》，乾隆《上元县志》三卷《疆域》。
㉙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285页。
㉚ 《白下琐言》卷二。
㉛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城厢》；《潮州会馆记》，《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40页。
㉜ 《白下琐言》卷二、三，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城厢》，嘉庆《江宁府志》卷一二《建置》，陈作霖：《运渎桥道小志》和《凤麓小志》。
㉝ 民国《旌德会馆志·原始》。
㉞ 《旌德会馆志》，嘉庆《旌邑会馆记》。
㉟ 郑澍若：《续板桥杂记》。